# **佛学典籍推荐问题研究——以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为背景**

孙国柱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中国近现代各种推荐书目，系统探讨了佛学典籍在国学书目中的安置问题。经过研究可知，佛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有能力也应该阅读一些佛学典籍；与此同时，可以从现代教育的诸多途径引导学生的阅读理解。在此过程中，尤其应该注重佛教文化的双向性，即一方面应该充分尊重佛教文化的独立性和整体性，佛教文化有不能被完全学科化的维度存在，另外一方面应该充分注重佛教文化的知识属性和知识功能，积极发掘佛教文化的学科价值。研究可知，佛学典籍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此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佛学典籍的解读与诠释问题，并做好相应的教育配套工作。阅读佛学典籍，对于大学生的生命成长可以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于大学生阅读书目提供既符合历史发展脉络又具有文化价值关怀的操作性参考。

**关键词：**佛学典籍；国学书目；大学教育

#### 序言

如何在大学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一个时代课题。在当下中国，为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各种形式的“大学生书目”，比如“校长推荐导读书目”、“大学生必读（应读、选读）书目”，等等。大学生书目的范围，往往东西并包、文理交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专业教育之不足，并反映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格局。本文的写作，仅仅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即在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大学生书目中是否可以置入佛学典籍？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佛学典籍在本文的内涵共有两个层面，一是佛教的经典系统，即经律论、语录等；一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体现佛教精神的文本生态，比如《大唐西域记》、《阅藏知津》等。另外，本文之所以使用佛学典籍，而不使用佛教典籍的原因在于：在中国，佛教之教其本义为教化或教育，“佛学”的说法更容易突出其哲理性。

那么，现在可以提出这些问题：第一，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应该如何在导读书目、经典阅读中置入佛学典籍？这些置入的佛学典籍要考虑到没有国学根底的读者是否有能力消化。[[1]](#footnote-1)第二，置入的佛学典籍，选择的原则和标准应该怎么确立？第三，附带讨论一下，大学生应该如何阅读佛学典籍，在教育体制内的相关措施应该如何配套？下面首先结合书目推荐史尝试述之。

#### 一

如何在国学书目中安置佛学典籍？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历史上的参考。[[2]](#footnote-2)下面稍微推介一二。

欧风美雨中，民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十分激烈。在当时发生了许多论争，“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就是其中一场。1923年3月4日，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一书目是为了清华学生在出国留学前，能够把握学习国学知识的方法与门路。胡适所开列的国学书目，共分三部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在工具之部，胡适推荐了丁福保等译编的《佛学大辞典》。在思想史之部，胡适罗列了印度佛教（根本佛教时期的《佛遗教经》、记载部派佛教的重要著作《异部宗轮论述记》）和中国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的重要典籍，共二十三种，约占思想史部全部书目的五分之一。有趣的是，《清华周刊》的记者面对胡适所开的洋洋洒洒的书单，不由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清华周刊》记者1923年3月11日致胡适之信）对此，胡适亦进行了答复，在原来国学书目的基础上精简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虽然这份书目不再有《圆觉经》等，但是依然保留了《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针对胡适开设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梁启超等学人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一璀璨的文化争鸣现象。[[3]](#footnote-3)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启超先生开列的国学书目中，没有任何一部佛经——仅仅在“（戊）随意涉览书类”加了一本慧立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并在下面附注“此为玄奘法师详传。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之可以增长志气。”[[4]](#footnote-4)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佛教的成就尤为推崇，甚至认为在某些方面相比印度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在国学书目中没有开列任何的佛经呢？笔者推测，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在于梁启超先生认为佛经对于国学入门的学生而言有点太过于困难了。这种考虑在胡适处似可以得到验证——1920年，胡适针对中学生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其中并无任何佛经。

除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论争外，民国“青年必读书”征求启事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5]](#footnote-5)事件缘起于1925年新年伊始，《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京报副刊》，1925年1月4日，第26期）。其中，在“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部分，从2月11日开始至4月9日结束，《京报副刊》共刊出78份名流学者列出的书目。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林语堂、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名流先后参与其中，但不是每位学者都会给出肯定性意见，比如鲁迅直言“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67期)鲁迅等学者的做法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将“青年必读书”推向争鸣的高潮。在这套丛书中，各家推荐的书目千差万别，其中不乏一些较为侧重佛教的，比如庄更生推荐了《传习录》、《老子》、《庄子》、《六祖坛经》、《玄奘西域记》、《金刚经》、《四书》、《因明入正理论》、《历代名人词选》、《昭明文选》（《京报副刊》，1925年2月28日，第74期）。有趣的是太虚大师所选的十部书籍并不偏重佛教，而着眼于文学、科学和文化，可见佛教自身所具的开明立场。（《京报副刊》，1925年3月25日，第99期）[[6]](#footnote-6)现在看来，相比“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这次“青年必读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针对青年群体，受众明确；其二，要求所选书目要少，以十部为限，可读性强；其三，参与群体众多，代表性强，比如太虚，作为佛教人士亦参与其中。

放开视角，可以发现民国时期诸多著名学人都开列了富有个人风格的书目清单。下面略举数例。

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第2期第2册）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为中学生列举了应读典籍39种，其中有龙树的《中论》。

1925年，李石岑所著《关于佛法研究之重要书籍：附表》（《民铎》杂志第6卷第1期），着重介绍了法相宗、法性宗、禅宗、净土宗的主要典籍，在附录一为“四律五论”，附录二为“关于相宗参考书”。

1925年,顾颉刚开列了一个包含有14种书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的目录,《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等赫然在列。[[7]](#footnote-7)

1926年，汤用彤先生在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上发表了《佛典举要》一文。[[8]](#footnote-8)这一书目对于印度佛学、中国佛学的历史脉络都有充分之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汤用彤先生的佛典观，对于深入研究佛学的人来说，有重要参考价值。

1926年，担任印度哲学讲师的邓高镜所编《佛学书目》，共分工具书、入门书、研究书三类，较具专业性价值。[[9]](#footnote-9)

1935年，刘天行所编《佛学入门书举要》（《海潮音月刊》，第16卷第2号）以分类的方式收录了佛学入门书籍多种，计分通论、杂论、文献、辞典、历史、经解、各宗专论、文学等，并附有扼要评论，为上乘之作。

民国时期，王云五先生编选的《国学基本丛书》可谓鸿篇巨制，影响深远。该套丛书共分两集，初集100种，二集300种，共400种，由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至1947年陆续编辑印行。该套丛书是在参考13种“国学入门书目”的基础上选定的，大都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可供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参考或阅读。[[10]](#footnote-10)该套丛书收录了不少佛学典籍，比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大乘起信论》、《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等经典作品。除此之外，在目录学中还收录了《阅藏知津》。这套丛书具有博采众长的特点，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荐国学的书目可谓琳琅满目。下面略加叙述。

钱穆在《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中认为，至少有7部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总纲，也是中国人必读之书。这7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如果再拓展一下，则《大学》、《中庸》也可以加入，则总共为9部。这一主张，是钱穆先生于1967年12月17日“复兴中国文化会”第十次学术讲演提出，并发表在1968年2月的《青年战士报》。[[11]](#footnote-11)

1979年，蔡尚思在《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开列了一张《中国文化基础书目》，大约有120多种。蔡尚思后来加以缩减，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有40种——其中文学10种，史学6种，哲学思想方面20种，科学4种。其中，在哲学思想方面，推荐了《金刚经》或《六祖坛经》代表佛学。[[12]](#footnote-12)蔡尚思对于佛教文化的重视，还体现在另外一篇文章《最能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四大祖师》，文中这样写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头二个是孔子与韩非，其次是佛教。”[[13]](#footnote-13)

1982年，张岱年委托郭朋撰写了《有关中国佛教的思想文献简明目录》，从题名亦可知，该份目录侧重于中国佛学的思想，除了一些重要的佛学史料（如经录、僧传）外，对于佛教主要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核心典籍皆有推介。[[14]](#footnote-14)

庞朴、刘泽华主编，宁稼雨、葛荃副主编的《经典常读：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三十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推荐了《坛经》，并以“禅的化境”为题加以推荐。

此一时期，还有两份比较著名的大学生推荐阅读书目。第一份是《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此乃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由任继愈、张岱年、季羡林、楼宇烈、方立天等50多位著名教授联合推荐，范围涵盖文史哲等多个领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该套书目包括推荐应读书目30种，推荐选读书目30种，其中在应读书目中开列了《坛经》。[[15]](#footnote-15)第二份为《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张岂之、徐葆耕主编，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1997年9月），在参考清华大学校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该套书目共有80种，其中含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类，每类20种，在“中国文化”一类中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坛经》。[[16]](#footnote-16)这两份大学生书目，对于中国教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当时社会上，方洲主编的《青年必读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亦广有流行。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其中“首选书”部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首选书三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部分选择了《金刚经》和《坛经》；在“必读书”部分，向读者推荐了“处世与修养”等16个学科或类别的130部书，选编了南怀瑾的《金刚经说什么》和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书目涉及国学类典籍，也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比如，由季羡林先生负责主编、14位北京大学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外文学书目答问》（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知识出版社编辑的《人间天书—宗教典籍举要》(1989年)，王燕钧和王一平编著的《国学名著200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等。当然，也有许多国学导读书目，并没有罗列任何佛经。

此外，邓咏秋、李天英编的《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可谓推荐书目的集成之作，对于书目的选择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期待有更多类似书籍出版。

仅从以上书目导读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在国学书目导读中，完全可以增添佛学典籍。无论从学科价值而言，还是从文化影响来讲，佛学典籍在中华文明经典体系中都应该占据一席之地。在当下中国，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根本上要求教育事业应有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类导读书目，应该成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又，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丰富的宝贵资源，总有一些精神文明成果或文化形式可以满足个人所需。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影响日益广大，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影响难以想象。

其二，不具国学根底的人亦可以阅读佛学典籍。从教育方法的角度而言，佛陀入乡随俗，方便说法，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生活化的，说法的对象也有不识字的平头百姓。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亦非常注重教化的方便，因此出现了许多故事性、文学性都很强的文本，可供选择的范围非常宽阔。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佛教的《百喻经》，有许多生动善巧的故事。[[17]](#footnote-17)至于禅宗，讲究不立文字，有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说法，更兼禅宗的形成完全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对于富有慧根的国人来讲，阅读起来并没有根本性的文字障碍。在这方面，《坛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坛经》是被尊称为“经”的中国佛学典籍，是佛教中国化在义理层面独立的标志。《坛经》本身使用了许多通俗的白话，也包含了许多经典的故事（公案），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没有阅读的困难。比如钱穆在《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一文中款款地回忆了自己当年阅读《坛经》的情形——

这是在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来写的书。这书篇幅不大，很易看，也很易懂。……我记得我看《六祖坛经》，第一遍只看了整整一个半天，就看完了，但看得手不忍释。那时很年轻，刚过二十岁，那天星期，恰有些小毛病，觉得无聊，随手翻这本书，我想一个高中学生也就应该能读这本书的了。[[18]](#footnote-18)

另外，即使不能阅读理解，也不妨读诵记忆。章太炎先生在为数不多的国学书目里推荐了《中论》，该论为三论宗根本经典，义理虽精妙，文字却艰深。章太炎认为“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学诸生，年在成童以上，记诵之力方强，博学笃志，将从此始。若导以佻奇，则终身无就。”[[19]](#footnote-19)也就是说，在章太炎先生看来，即使一时无法理解哲理深奥的佛学典籍，但是通过记诵的“童子功”完全可以打下坚实的国学知识基础。

#### 二

所谓的经典文本，往往是某一种文化的代表。那么，在大学生导读书目中，应该选择哪些佛学典籍才能够举一反三，掌握佛教文化的全体呢？儒释道三教都是复合文本形态的，不奉一本经典为权威，经典系统十分庞大，至于佛教号称有“三藏十二部”，可谓浩如烟海。更兼佛教有显密、南北、汉藏之别；一般而言，就宗派而论，尚有八宗（性、相、台、贤、禅、律、密、净）之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选择某一部佛教经典代表全体佛教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未必如此。由于佛教具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和主张，即所谓法印（有三法印、四法印、一法印等说法），几乎每部佛经都能代表佛教的根本精神而具有标月之指的殊胜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佛学典籍的标准则可以依赖于历史上的流行程度、理论上的兼容程度和语言上的可接受程度。

在历史上，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三部经典，并颁行天下。唐玄宗的做法是大有深意的，这三部经典可以分别代表儒道佛三家，对于协调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有极大帮助，体现了大唐盛世兼容并包的文化胸襟，也奠定了后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范式。到了明代，成化皇帝创作的《一团和气图》，更是生动形象地传达出儒释道三教同体共生的关系。事实上，历代不乏统治者对于佛教多有尊崇。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朱棣曾主持编纂《御注金刚经集注》，这部集注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堪称经典。

至于中国古代一般的知识分子，唐代以降，阅读佛学典籍蔚为风尚。比如朱熹赶考时，其书箧中唯有《大慧语录》一帙而已。到了明代，心学诞生，谈禅论虚，遍于天下，甚至有出家为僧者，在当时，许多学者以通达三教为荣。

近代以后，诸多高僧大德、学士专家在推荐佛学书目方面皆有不凡之表现。有“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尊称的杨文会，在《学佛浅说》中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一般学佛者而言，可以“从解路入”，先读《大乘起信论》，研究明了，再阅《楞严经》、《圆觉经》、《楞伽经》、《维摩经》等，渐读《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以至《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等论。在此基础上，依解起行。[[20]](#footnote-20)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中，杨文会制定了非常系统而严格的学习计划，按照整体要求，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种。具体步骤则是按照一至三年依次展开。随后是专门学，自第四年起，或两年，或三五年。兹不赘述。[[21]](#footnote-21)这份课程，是佛教近代化转型时期的重要见证，值得细致研究。在杨文会的书单中，《学佛浅说》是针对大多数初学者的，至于《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则是针对有系统学习佛教文化知识愿望的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杨文会所选择的书目中增添了唐代文章大家王勃的《释迦如来成道记》，还有《高僧传》、《释氏稽古略》等历史传记类资料，这对于初学者来言，更容易引发兴趣。杨文会先生所推荐的佛学书目，是为学佛者特意制定的，作为文化知识加以学习不无裨益。事实上，杨文会在佛学人才培养上确实功绩蔚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誉说：“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22]](#footnote-22)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佛学书局特别编辑了署名“杨文会选订”的《释氏十三经》，包括《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梵网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维摩诘所说经》、《楞伽阿跋多罗所说宝经》及《妙法莲华经》等，分册整套出版，在民国时期广为流通。不过，根据考证，“释氏十三经”的说法，在杨文会的相关著述中并没有找到出处。[[23]](#footnote-23)但是，《释氏十三经》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为社会主流文化领域做出贡献的愿望。[[24]](#footnote-24)

在民国，另外一位著名的佛教学者丁福保在佛学典籍传播与推广方面用力甚勤，成果颇多，相关成果汇编在《丁氏佛学丛书》。丁福保还笺注了十六种佛经，这其中以《心经详注》及《六祖坛经笺注》尤其令人称道。[[25]](#footnote-25)丁福保先生的佛学注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现代学术的特征，值得重视。除此之外，弘一大师编选的《佛学丛刊》（全4册，世界书局，1937年），欧阳竟无编辑的《藏要》（共3辑，300余卷），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佛学典籍精品，后由中国书店合并出版（《弘一大师欧阳竟无藏要合编》，全28册，2008年），是“相对比较理想的，既有权威性、又有实用性的佛教经籍选刊”。[[26]](#footnote-26)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大陆学界最为流行的当属石峻、楼宇烈等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这套丛书主要以中国佛学资料为主，时间上从汉代至民国时期，除此之外还专门选辑了比较重要的佛教经论传译文本。该套丛书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到1990年相继公开出版，共三卷九册，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学术的发展。但是，显然这套丛书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而是学术资料书、工具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单独选编了佛学典籍。比如任继愈的《佛教经籍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方立天所编《佛学精华》（北京出版社，1996年）。以上数种都是以学术或教学为目的而编选的。

1998年，[李淼](http://book.ly.superlib.net/search?sw=%E6%9D%8E%E6%B7%BC&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郭俊峰](http://book.ly.superlib.net/search?sw=%E9%83%AD%E4%BF%8A%E5%B3%B0&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主编的《佛经精华》（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亦具有一定的水准，后来再版。该套丛书精选佛经15部，分别是《四十二章经》、《金刚经》、《宝积经》、 《华严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胜鬘经》、 《楞伽经》、《圆觉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楞严经》、《心经》、《坛经》。

教界在编选佛教书目方面亦十分积极，在中国大陆，中国佛学院推出了《释氏十三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该套丛书是在民国上海佛学书局《释氏十三经》的基础上重新选编而成，换下了《圆觉经》、《梵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无量寿经》，加入了《胜鬘经》、《十住行道品经》、《金光明经》、《解深密经》、《大日经》、《坛经》。编纂此套丛书的目的“不仅便于一般研习，而且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我国大乘佛教各宗派的性质。”[[27]](#footnote-27)

另外，北京广化寺，在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这一平台的推动下，针对一般的学佛群体编纂了“欢喜地”“善慧地”等修学丛书。其中，“欢喜地修学丛书”共计四本，分别为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佛典选读》、《传统文化经典选读》，达摩难陀的《佛教徒信仰的是什么》，圣凯所著《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善慧地修学丛书”共计五本，分别为《法句经》、印顺法师所著《佛法概论》、陈秀慧所著《高僧行谊》以及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在家律学》、《禅修入门要典》。其中，《佛典选读》，根据其《编后语》所言，基于初机在家学佛者如何处理佛法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生活中活出善男子与善女人的智慧，最终选了《十善业道经》、《善生经》、《玉耶女经》，为了方便学习，还附上了太虚大师《十善业道经讲记》、《善生经讲记》，以及藕益大师的《十善业道经节要》、《善恶十界业道品》。《禅修入门要典》，在“禅经篇”选了《念处经》、《大念住经》、《慈经》、《慈经注》、《慈愿的观修法》；在“禅典篇”选了《童蒙止观》（共有校释、译文两种）、《六妙法门》（共有校释、译文两种）。可见，这套丛书充分考虑了初学者的条件与学习次第，充分考虑到了佛学修习的内在需要。

在海外，佛光山星云所编着《佛教丛书之二：经典》（佛光出版社，1995年）、星云总监修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全132册，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1998年）亦颇有建树，至今流行。这其中，尤其是《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集合两岸众多学者之力白话诠释而成，允称良作。根据星云法师总序：这套书所呈现的风格具备下列四项要点，分别是启发思想、通顺易懂、文简义赅、雅俗共赏。[[28]](#footnote-28) 这些书目往往是针对信众或者学僧，亦具有鲜明的信仰立场。

由于近四十年来，文化日益昌明，信仰更加自由，出版事业日渐繁荣，各类佛学类书籍举不胜数。在此略举两例，比如中华书局古籍小组推出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这套丛书的主要编纂目的是为了便于青年研究者入门，从中精选，并加以点校、注释。这套丛书作为一个系列，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佛学典籍有《坛经校释》（1983）、《华严金师子章校释》（1983）、《五灯会元》（1984）、《三论玄义校释》（1987）、《宋高僧传》（1987）、《童蒙止观校释》（1988）、《大乘起信论校释》（1992）、《高僧传》（1992）、《古尊宿语录》（1994）、《出三藏记集》（1995）、《神会和尚禅话录》（1996）、《成唯识论校释》（1998）、《法苑珠林校注》（2003）、《比丘尼传校注》（2006）、《祖堂集》（2007）、《肇论校释》（2010）、《因明大疏校释》（2013）、《释氏要览》（2014）、《北山录校注》（2014）、《居士传校注》（2014）、《阅藏知津》（2015），等等，目前这一系列还在不断增添中。这套丛书虽然学术性较强，但由于有学术性校注，所以对于相当一部分读者而言，也可以作为佛学入门书籍。

另外，赖永海先生主编的“白话佛教十三经”（中华书局，2010年）亦相当流行，该套丛书选编有《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该套图书的特色在于有白话翻译，对于文言文功底不够的读者而言提供了入门之阶梯。

如果将出版也纳入本研究的视野，则可以发现金陵刻经处的流通佛典目录、《佛学书局图书目录》（上海佛学书局出版）[[29]](#footnote-29)、《佛学出版界》[[30]](#footnote-30)、《佛学书目表》（北京佛经流通处）[[31]](#footnote-31)等材料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在分析时需要运用一定的统计学方法，兹不赘述。

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阅读史的材料也可以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比如，王余光、徐雁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中国阅读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以上的例子来看，最低限度的有代表性的佛学书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可知，这些书目选编时，往往照顾以下情况：其一，照顾初学者的情况，以简驭繁，以少驭多，所谓“十三经”之说就是典型。其二，尽量选择全面，能够代表佛教的各大宗派，比如杨文会所推荐的佛教书目，以及中国佛学院的“释氏十三经”。其三，照顾佛教的历史性和现代性，比如北京广化寺所编的“欢喜地”“善慧地”等修学丛书。其四，对于学术（文化）和信仰两种立场有着自觉的区分，在具体的操作上亦相应有两个路径，一是从信仰或生命的文化角度，佛学院往往择取此一路数；一是从学科或专业的知识角度，这方面如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学者所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即是典型。

那么，从大学生阅读书目的角度而言，又该如何选择最低限度的佛学典籍呢？其标准又是什么？除了上面四种考虑之外，笔者认为另外应该注意的是版本的选择。诚如历史学界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经典也是这样，经典本身的意义是在诠释之中体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阅读的佛学典籍，就要注意简择。比如，《金刚经》是选择朱棣的集注，还是江味农的讲义，两者有一定的区别。另外，任何一本经典的形成往往经历了历史选择过程和群体书写过程。比如《坛经》就拥有一个复杂的版本丛林，较有代表性的有唐敦煌本、晚唐惠昕本、北宋契嵩本、元宗宝本等。其中契嵩本的出现使《坛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主要参阅了《曹溪大师传》、敦煌本和王维《碑铭》。可见，坛经一直处于历史的书写状态，而坛经进入正藏也是很晚的事情，那么，坛经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必然加入了很多内容。[[32]](#footnote-32)从某种角度而言，甚至可以说，慧能并不是《坛经》的作者，慧能仅仅是一位被文明选定的代表而已。《坛经》是一个集体产品，在历史长河中，选择者也承担了创作者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是“宗宝本”还是“敦煌本”呢？不同的文本选择会开启不同的阅读世界。

那么，在具体的佛学典籍上，应该如何选择呢？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处理方式。

其一，如果选择一本的话，《金刚经》、《心经》、《坛经》等经典皆可以择其一。正如《金刚经》所云：一切诸佛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金刚经》包含着佛学“破相扫执”的根本性思维方式。佛教中有龙树为八宗共祖、文殊为七佛之师的说法，缘起性空的思维方式确实是整个大乘佛学的理论基础。

其二，如果选择多本的话，有非常之多的选择，在此仅推荐一种，即楼宇烈先生的“三论”、“九经”、“一录”。

我还有一个想法。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什么书都看。……佛教方面的基本典籍是：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九经（《金刚经》附《心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楞严经》、《圆觉经》、《坛经》）、一录（《景德传灯录》）。[[33]](#footnote-33)

这一书目，照顾了佛教各大宗派的根本义理，同时也注重佛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实际影响。

其三、选编类，有时亦可将摘编类涵盖其中。可以从佛学典籍中按照主题、门类进行编选。这种类型的佛学典籍，针对性更强、灵活度更高、包容性更大，还可以附加许多现代性诠释，但是缺点在于有可能破坏佛教经典的完整性。

其四、诠释类。一些现代人撰写的佛学入门书籍。这类佛学典籍的优点在于其语言和思想更容易满足时代的兴趣和品味。但是困难之处在于这类优秀的佛教入门书籍并不是太多，解读的视角往往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在这方面，赵朴初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著作。

总之，在佛学典籍的编选方面，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值得人们探索。笔者在此稍加分类，以供讨论。

#### 三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文本是打不开的。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文本是死的，读者才是活的——在打开文本的过程中，人们理解和感受的方式决定了阅读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并不是说列出佛学典籍书目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

大学生阅读佛学典籍一方面要有充分的自主性，大学生处于生命成长阶段，需要正确的价值引导。需要事先指出的是，忽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回避佛教在当下社会的影响，都不可能找到现代社会与传统佛教打交道的恰当方式。

首先，阅读佛学典籍，并不是要阅读者理所当然地认同佛教，更不等于信仰佛教，而是说佛教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资源，可以为人们的生命成长提供助益。不妨以主张“全盘西化”（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为例。幼年的胡适接触的是传统儒学教育，尤其对于理学浸淫甚深，但在中华大地上，胡适是不能脱离佛道的熏染与滋养的。1936年1月9日，胡适回复周作人一封信，自称“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34]](#footnote-34)孔仲尼为孔子，王介甫乃王安石，张江陵即是张居正。这三位“大神”都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风范，非常符合1937年胡适致钱玄同信件中的自白:“……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35]](#footnote-35)至于“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应与歌利王割截佛陀身体之本生故事有关，此亦是胡适所追慕的人生境界。胡适曾经这样向朋友杨杏佛诉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36]](#footnote-36)这段自白可以作为胡适“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此一主张的注脚，如果不加微观透视，几乎无法想象，胡适的人生信条竟然借助佛教故事进行了另外一番演绎。从胡适的生命历程可见，道是无缘却有缘，胡适不信仰宗教，但不是要把宗教一棒子打死，而是用自己独特的文化立场和生命情怀，诠释了宗教内涵的超越精神。对于佛教如此，对于道教等其他宗教，胡适也是采取了这种处理方式。

可以肯定是，胡适对于佛道二教有许多真知灼见，也不乏误解之处。不过，这些丝毫不妨碍胡适对于佛道文化的吸收，甚至构成其个体生命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实验的胡适，虽然拒绝了宗教的超验领域，但是对于其合理性精神内涵，不仅有着有机的吸收，甚至有创造性转化了。胡适之于宗教，是基于文化立场的，任何宗教性的材料，不妨转化为伦理学上的精神养料，为成就人格之一大助益。了解此一关键，也就不难明白胡适立场坚定不移，而视野上又开明通透的根基之所在。[[37]](#footnote-37)

胡适如此，另外一位“五四”运动时期高举反孔大旗的著名人物吴虞也是这样，吴虞不仅积极倡导“新学”,而且还注意教导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从新近发现的吴虞为文学青年所开“必读书目”就可证明。[[38]](#footnote-38)原来，这位早年“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给人的印象乃是激烈反抗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日记中竟然这样感慨：“学术知识虽渐有系统，而于安身立命之地，终觉茫无所归着。”并自觉表示“此后当以佛学为归宿，先看老、庄、《居士传》、《高僧传》、《自省录》、《大乘起信论》。以后再依次读诸经……由此渐进，庶几入道，而不同游骑也。”[[39]](#footnote-39)

可见，阅读佛学典籍，本质上与信仰无关，而与生命有关。对于那些有信仰倾向或情结的人来讲，一个有健康、理性之信仰态度的人，亦当如圣凯所言：“不要让信仰代替生活，要让生活体现信仰。”[[40]](#footnote-40)主张整理国故的胡适，在好多人眼中是西化派的代表，却能够积极地吸收佛学中的精神养料，作为陶冶性情、培养人格的助益。胡适对待佛教的态度引人深思，也可以为当下人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西化如胡适者，尚且能够从国学中寻找到有益于己的精神财富。如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同情了解，进行创造性诠释，那么国学之于世人的益处将更加巨大。

打开佛学典籍需要多元、开放、通透的现代视野。虽然笔者一直在强调阅读佛学典籍的重要性，但是并非是为了佛学而佛学，更非一切以传统为是。对于现代人来讲，在当今世界尤其需要以平等之心态对待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培养多元开放的视野、格局与眼光。在此，楼宇烈先生的主张值得效法。楼先生主张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体的操作路径，其一是“三家、三科、三学”，分而言之即三家儒释道，三科文史哲，三学天地人。[[41]](#footnote-41)其二为“四通”：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楼先生认为，“四通”，才能“八达”。做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学者们要有这样的志向。[[42]](#footnote-42)上面两种主张，如果去掉重复的三家三科，则可以概括为“三学四通”。在当前知识爆炸、学科分化日益精细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或通才了，但是非常有必要在价值关怀上保持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楼宇烈先生所主张的“三学四通”，以人文立本，以传统为根，对于人们从整体综合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佛教文本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读的方式。比如，在佛学典籍选定之后，在大学教育体制中应该增加相应的导读材料，或者匹配相应的专业课程进行讲解。这样才能够从体制上避免将佛学研究变成宗教传播的可能歧出。在笔者看来，宗教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根本是无法回避的。长期忽视的结果，更有可能造成当代大学生价值虚无、价值混乱、价值歧出的现象在大学生校园中反弹。更为理性的做法，是用更为健康、文明的教育（尤其应注意通识教育、宗教学教育等现代教育视野）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和主体人格。

如果从知识分类的视野来看，佛教文化进入教育系统具有双向性，即一方面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是不能被学科化的，应该保持佛教的文化独立性、价值整全性，比如禅学的打坐等；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具有知识性维度，是可以被充分学科化的，比如佛教文学、佛教历史学、佛教哲学等。从某种角度来讲，佛教文化的双向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性。

对于佛教的文化性维度，在此有一个问题应该谨慎处理，那就是如果想要保持佛教文化的独立性，更好地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有必要自觉地弘扬佛教的文化维度。在大学教育里面不应推广宗教，宗教与教育分离，是大势所趋，代表着现代社会的进步。但是宗教与教育又是密不可分的，否定宗教的文化属性，也是不可行的。如众所知，佛教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当下中国诸多的宗教学理论中，中国学者最为重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在这方面典型的人物如楼宇烈、方立天、牟宗鉴、张志刚等诸位先生。可以这样说，“宗教文化论”突破了宗教“鸦片基石论”的前苏联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的重要结晶。在具体的大学教育方面，应该运用“宗教—文化”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佛教。

对于佛教的知识性维度，在学科化的解读过程中，应该充分注重佛教文化的知识属性和知识功能。[[43]](#footnote-43)中国宗教本来是文化的形态，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属性和知识功能尤其明显。在这方面，相关支撑性观点甚多，比如任继愈先生就曾指出“佛教在当时曾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也曾帮助了中国的医学、历法的发展。佛教的著作中也带来了‘因明’（逻辑）和一些比较细致的分析方法，从而刺激了中国说理的散文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功绩，都有它的历史的意义，我们一点也不愿抹煞它，相反地，我们今天也还要肯定它。”[[44]](#footnote-44)使用学术的方式处理，在某种情况下等同于佛教文化的学科化。在佛教文化学科化时，应该结合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甚至超学科的方式进行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切入。在此，全方位，是指文化、知识在价值上的全面提炼；多维度，是指方法上的综合运用；深层次，是指学术质量上的深度挖掘。事实上，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内，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往往放在中国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或专业框架下加以研究。除此之外，古典学、经学等，亦与本文讨论的话题尤其紧密。总之，运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乃是发现佛学独特价值的关键所在，它可以将佛教文化的部分内容变成具有公共意义的知识和价值。

教育的水平由教育的质量决定。在笔者看来，佛学典籍确实可以在现代教育中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合而言之，正如毛泽东所云，“佛教是文化”。[[45]](#footnote-45)佛教是人类探索生命真谛过程中形成的文明结晶，佛教是人类重要的文明形态之一。阅读佛学典籍有助于打开人们的精神视野，增强人文素养。分而言之，佛教内部蕴藏着丰富的真善美方面的价值材料——在佛教文化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伦理资粮和美学材料。在哲学思想上，佛教的义理博大精深。与此同时，因明学作为世界重要逻辑体系之一，对于思维的锻炼亦大有帮助。在伦理资粮上，佛教的价值观念（比如慈悲、智慧、无我等）还有助于培育道德素养，提升人生境界，解决心理问题。在美学材料上，“天下名山僧建多”[[46]](#footnote-46)，在旅游时往往可见佛教的文化符号（对联等），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果没有一定的佛学知识就无法品尝个中况味。当然，佛学典籍的教育意义远不止于此，笔者仅仅略举数端。

#### 结语

当代大学生需要读什么？可以读什么？应该怎么读？这确实是个问题。本文仅仅结合中国近现代各种推荐书目，尝试探讨了佛学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安置问题，并不想得出某种确定的结论。另外，本文的写作背景不自觉地限定在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制度、传统中人们的兴趣与品位。希望本文的研究对于大学生阅读书目能够提供既符合历史发展脉络又具有文化价值关怀的建议。

经过研究可知，在大学生阅读书目中，完全可以开列佛学典籍。在具体如何选择佛学典籍方面，有许多历史经验可循，这点至少可以从钱穆先生的个人体验及其所推荐的“中国文化七书”中找到例证。另外，上个世纪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及“青年必读书”争论，是一个颇具公共意义的事件，它表明佛教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并没有为人们所忽视，反而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占据一定的地位。另外，从学者、高校以及社会推荐等层面亦可以看出佛学典籍在国学书目中的重要地位，不应该被人们所抛弃或遗忘。当然了，归根结底，大学生在国学教育中也有相应的自由选择权。

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选择佛学典籍还有许多创新的空间。这首先体现在佛学典籍的代表性问题，佛学典籍的推介问题，以及尤其重要的经典诠释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文本的意义是寓于解读、诠释过程之中的。如果不能处理好解读、诠释的问题，那么，单纯的阅读活动（比如读经）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导读之“导读”二字显得尤其重要。

最后，笔者认为，同样的佛教经典文本，在不同的教育体系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教育效果。因此，在解读的立场上，从文化、学术的价值立场解读佛学典籍更为贴切，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佛教文化的双向性，即一方面保持佛教文化的独立性整体性，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佛教文化的知识功能、学科价值，而这毫无疑问需要借助哲学、艺术学、宗教学（比如宗教文化学或文化宗教学）等学科或专业的力量，需要借助国学教育的体制支持，与此同时，相关的导读作品或配套课程亦是重要的保障。有理由相信，对于现代大学教育，佛学典籍在培养人文素质、锻炼思维能力、解决心理问题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总之，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粗浅的尝试，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讲，这一神圣事业将永远在路上。

1. 在本文，国学意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某些情况下，两个概念是通用的。 [↑](#footnote-ref-1)
2.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佛教典籍的入门推荐问题，故有关佛教目录、佛教典籍，乃至藏经研究等文献方面的研究性著作不做讨论。至于《阅藏知津》这样的著作，也暂时排除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外。 [↑](#footnote-ref-2)
3. 胡适与梁启超两人推荐书目详情，可见《梁任公胡适之先生审定研究国学书目》（上海：亚洲书局,1923年）。相关学界研究的情况，可见翟程：《梁启超与胡适“国学书目”之争研究综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2月第27卷第1期。 [↑](#footnote-ref-3)
4. 梁启超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出自《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 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第4240页。 [↑](#footnote-ref-4)
5. 该套书目资料与事件详情，可见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footnote-ref-5)
6. 太虚所选十部书籍为《因明入正理论疏》（学说思想规律）、《论语》（中国思想代表）、《国故论衡》（中国学说结晶）、《成唯识论》（印度哲学结晶）、《瞿译西洋哲学史》（西洋哲学结晶）、《科学大纲》（近代文明特色）、《克氏互助论》（社会进化哲学）、《史记》（记事文学代表）、《宏明集》（辩理文学代表）、《杜诗》（有韵文学代表）。 [↑](#footnote-ref-6)
7. 邓咏秋、李天英编：《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8页。 [↑](#footnote-ref-7)
8. 该文发表于《南大周刊》第34期(二周年纪念号,第55—60 页)。详情可见汤用彤著、赵建永校注《佛典举要》，《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 [↑](#footnote-ref-8)
9. 出自[杨廉](http://book.ly.superlib.net/search?sw=%E6%9D%A8%E5%BB%89&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辑：《海天集（北大一九二五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刊）》，北京：北新书局， 1926年12月，第43-61页。 [↑](#footnote-ref-9)
10. 13种国学入门书目是分别是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胡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目》、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陈钟凡的《治国学书目》、支伟成的《国学用书类述》、章太炎《中学国文书目》、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汤济沧的《中小学国学书目》、吴虞的《中国文学选读书目》。详情可见王云五：《新目录学的一角落》，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52-53页。 [↑](#footnote-ref-10)
11. 在《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一文中，钱穆先生共举《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九部书。详情可见钱穆：出自《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4册，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17-244页。 [↑](#footnote-ref-11)
12. 详见蔡尚思：《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收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出自《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第20-24页。 根据文末提示，该文最初发表在《书林》（1982年第5期）。 [↑](#footnote-ref-12)
13. 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出自《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第93页。 [↑](#footnote-ref-13)
14.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28-232页。 [↑](#footnote-ref-14)
15. 邓咏秋、李天英编：《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12-116页。 [↑](#footnote-ref-15)
16. 邓咏秋、李天英编：《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09-112页。《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后来形成新版《清华大学荐读书目》（胡显章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7年），在新版《清华大学荐读书目》“中国文化名著”共30种里选了“坛经”。 [↑](#footnote-ref-16)
17. 在这方面，鲁迅与《百喻经》的因缘，尤其为人津津乐道。在庆祝母亲60大寿时，鲁迅曾施资委托金陵刻经处刊刻《百喻经》。后来，鲁迅还鼓励王品清校点《百喻经》，并为该书取名《痴华鬘》并作题记。更多研究详见[娄国忠](http://trend.wanfangdata.com.cn/scholarsBootPage/toIndex.do?scholarName=%E5%A8%84%E5%9B%BD%E5%BF%A0&unitName=undefined" \t "_blank)：《鲁迅与佛教》，《世界宗教文化》， 2003年第4期 。 [↑](#footnote-ref-17)
18.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钱宾四先生全集》（44），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footnote-ref-18)
19. 邓咏秋、李天英编：《中外推荐书目一百种》，山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6页。 [↑](#footnote-ref-19)
20. 杨文会：《学佛浅说》，出自《等不等观杂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第7页。 [↑](#footnote-ref-20)
21. 详见杨文会：《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出自《等不等观杂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第13-14页。 [↑](#footnote-ref-21)
22.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99页。 [↑](#footnote-ref-22)
23. 相关研究详见何建明：《近百年佛藏选辑出版回顾》，《法音》，2008年第12期(总第292期)。按:此文对于佛教藏经的选辑情况搜罗较广，对于本文的撰写具有参考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佛藏选辑（有时称为“入藏”）、读经、阅藏这些都与佛学书目推荐问题有一定关系，但是彼此之间又多有不同，故不放入本文的写作考虑范围之内。 [↑](#footnote-ref-23)
24.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释氏十三经”之外，佛教《新六经》的说法亦颇值得注意。根据苏渊雷的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渊雷至重庆北碚缙云寺参谒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提出《新六经》的创意，按照设想，《新六经》为《维摩诘》、《法华》、《金刚》、《阿弥陀》、《大涅盘》及大本《华严》六种”。详见苏渊雷、高振农选辑：《前言》，出自《佛藏要籍选刊（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 [↑](#footnote-ref-24)
25. 丁福保笺注的部分佛教丛书，现已放入《普陀山佛学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10册，分别是《金刚经笺注》（2013年）、《心经注》（2014年）、《观世音经笺注》（2014年）、《无量义经笺注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笺注》（ 2014年）、《无量寿经笺注》（2014年）、《观无量寿经笺注》（2014年）、《阿弥陀经笺注》（2014年）、《六祖坛经笺注》（2013年）、《遗教三经笺注（外二种）》（2015年）、《佛经精华录笺注 附佛藏经籍提要》（2015年）。有关丁福保的佛学传播视野，更多研究详见汪春劼：《[丁福保:近现代佛学著述编印的名家](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5e95104ddb4245936cacdd6fe7404022%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kns.cnki.net%2FKCMS%2Fdetail%2Fdetail.aspx%3Ffilename%3Dfyzz201508013%26dbname%3DCJFD%26dbcode%3DCJFQ&ie=utf-8&sc_us=14621228660061999892)》，《法音》，2015年第8期。 [↑](#footnote-ref-25)
26. 何建明：《近百年佛藏选辑出版回顾》，《法音》，2008年第12期(总第292期)。 [↑](#footnote-ref-26)
27. 详见《影印<释氏十三经>前言》，出自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协会编：《释氏十三经》，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8月，第2页。 [↑](#footnote-ref-27)
28. 周学农释译，星云大师总监修：《十二门论》，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7年，《总序》，第1-2页。 [↑](#footnote-ref-28)
29. 相关情况可见“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佛学书局图书目录” 部分。<http://www.cnbksy.cn/literature/literature/fd753b55b833523ef15ad367f0124f5e> （阅读时间：2020年8月29日。） [↑](#footnote-ref-29)
30. 1933年在上海创刊。不定期。余了翁主编，佛学书局代理出版发行。主要刊发佛学刊物出版概况。仅出九期即停刊。该信息出自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1页。 [↑](#footnote-ref-30)
31. 根据该《佛学书目表》可知，北京佛经流通处设在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其天津分处，一设在法界四号路九十七号，一设在东南城角南马路草场庵前面清修禅院内。 [↑](#footnote-ref-31)
32. 孙国柱：《<坛经>慧能得法偈研究——兼谈校勘本与思想史写作对接之问题》，《中国佛学》第31期，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247—261页。 [↑](#footnote-ref-32)
33. 李四龙主编：《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footnote-ref-33)
34. 原文可见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 [↑](#footnote-ref-34)
35. 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footnote-ref-35)
36. 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footnote-ref-36)
37. 胡适著，惠文评注：《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48-152页。 [↑](#footnote-ref-37)
38. 王若：《新发现吴虞为文学青年所开“必读书目”》，《文史杂志》,1988 年第1期，第13页。 [↑](#footnote-ref-38)
39. 吴虞：《吴虞日记（上）》，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更多研究详见楼宇烈：《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 [↑](#footnote-ref-39)
40. 圣凯：《后记》，《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0页。又，笔者认为“信仰”一词用在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并不总是恰当贴合的，因为中国文化并不是信而仰之的，中国文化是内在超越的，更具体地讲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因此用修养等类似词汇来表达更为恰当。不过，为了随顺大部分人的习惯，依然使用了“信仰”这一词汇。 [↑](#footnote-ref-40)
41. 《为东方哲学呐喊——记楼宇烈教授》，原载于《北京日报》1995年8月18日第7版，采编者瞿会宁。 [↑](#footnote-ref-41)
42. 李四龙主编：《人文立本——楼宇烈教授访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footnote-ref-42)
43. 对于佛教文化知识功能的自觉强调，比较早的研究有舒乙的《佛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潜在能量》（《法音》，1991年第2期）。 [↑](#footnote-ref-43)
44. 任继愈：《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出自《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页。 [↑](#footnote-ref-44)
45. 详见游和平：《毛泽东眼中的佛教文化》，《党史博览》，2007年第 6期。 [↑](#footnote-ref-45)
46. 谢重光：《天下名山僧建多》，《佛教文化》，1992年第4期。 [↑](#footnote-ref-46)